

实证研究与理论探索的有益尝试

——读《日本工商资本与近代山东》

王新生

尽管给中日关系带来较大负面影响的历史问题具有浓厚的政治性,但与学术性历史问题也不无关系。这是因为,学术性历史问题研究的缺乏与不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政治性历史问题存在的基础。换句话说,立足于严谨实证基础上的学术性历史问题研究的新成果、新进展,将有助于政治性历史问题的解决。庄维民、刘大可撰写的《日本工商资本与近代山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2月版,下简称《日》),就是这样一种研究成果。

—

《日》书利用56万余字的较长篇幅,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和分析数据,分阶段地细致论述了近代以来日本对山东殖民侵略和经济扩张的历史,可谓实证性研究的典范。日本工商资本与近代山东的经济关系,涉及广泛的领域和不同的历史过程,可供研究的文献资料极其浩繁,尤其是大量日方档案和调查资料有待发掘和整理。但以往的中日经济关系史研究,借助的多是相关中文文献资料,研究论述的依据也大体以同期的中文文献为主,对日方文献资料的发掘、利用不够,很难对日本工商资本扩张活动及其与殖民政策的关系有全面、深入的分析。观点论述或以当时的评论为依据,或从当时直观笼统的描述中摘取论证,一般性叙事多于对历史过程的

实证量化分析。由于对文献资料掌握的不全面,研究中存在着许多模糊未知的领域,若干活动缺乏完整的脉络和清晰的轮廓,至于细节更是知之甚少,甚至在一些历来被视为了解比较充分的领域也依然存在诸多盲区。由于对许多历史过程和史实知之不详,结果导致对史实的误解和对文献史料的误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关研究领域著述陈陈相因、学术性不强、缺乏深度和广度的症结所在。

从对外扩张的需要出发,近代以来日本对以中国为中心的近邻国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留下许多调查资料、档案、各类机构与组织的专题或综合报告、私人撰述等。例如在山东地区,日本占领青岛时期,由日本青岛军政署、青岛守备军司令部、铁道管理部、民政部及所属机构所做的各种调查和青岛日本商工会议所编印的各种调查资料总数多达上百种,单是各种经济调查就有70余种。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满铁所属调查会、北支经济调查所、日本领事馆、青岛和济南的日本商工会议所、东亚同文书院、日本移民团体等机构多对山东各地物产资源、生产与流通、资本与市场、企业经营等进行了详尽的调查。1936年到1945年间,日本刊印的华北、山东经济调查资料和撰述,数量之多、种类之繁超过以往任何时期。这些资料涉及工商、矿业、交通、金融等各个部门,内容十分庞杂,可以作为了解这一时期日本工商资本在山东活动的第一手史料。但或因检索不易,或因文字隔阂,迄今为止这批资料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掘和利用。

《日》书作者潜心从事相关课题研究多年,不仅充分利用了国内图书馆、档案馆收藏的相关中外文资料,而且还广泛利用了日本国会图书馆所藏明治时期的图书、东洋文库收藏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书刊文献,以及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收藏的日本外务省与防卫厅档案、神户大学收藏的旧日文报纸资料等,

其中有半数的日文文献为首次用于学术性研究。在占有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作者将日本在山东的经济扩张分为“大陆政策”指导下的商贸开拓时期(1876—1913年)、独占山东政策下的权益攫夺与投资扩张时期(1914—1922年)、对华“积极政策”实施与投资调整时期(1923—1928年)、“经济开发提携”政策与投资扩张恢复时期(1929—1936年)、实施经济统制政策与控制山东经济命脉时期(1937—1945年)等5个时期,集中对日本殖民政策与经济扩张的关系、日本移民人口在山东各地的分布状况及职业构成的特征、日本工商资本在各个部门行业的投资分布与经营特点、日本资本与华商资本在工商界的竞争、日本技术引进的途径和设备水平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从而为读者描述出一幅日本工商资本在山东扩张的完整画面。

二

《日》书在研究方法上也进行了有意义的理论探索。日本对山东的殖民扩张是其侵华总方针、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同时山东又是日本经济势力扩张的重要地区,其中若干历史过程、事件及问题在近代日本侵华史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工商资本与近代山东的关系是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也是近代经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种关系形成于殖民化与现代化的双重背景之下,是近代日本对华殖民经济扩张的产物,因而对于研究近代日本对华经济扩张、认识区域社会经济嬗变特点具有重要的意义。《日》书在充分利用国内和日本方面的文献档案、各类调查资料及地方文献的基础上,将殖民政策研究与经济扩张研究结合在一起,较完整地复原了半个多世纪中日本对山东殖民侵略和经济扩张的历史,同时努力阐明日本军、政、工

商资本扩张活动与区域社会经济演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脉络,在有关日本对华殖民政策和经济扩张综合性研究尚不多见的情况下,起到拓宽研究视野、深化历史认识的作用。

具体地说,在殖民政策和经济扩张方面,《日》书将重点放在三个问题上,即第一,分析了1876—1945年70年间,尤其是1895—1945年50年间日本对山东的殖民政策与实施在几个不同时期的内容及变化,由此探讨日本对华殖民政策、战略指导在山东的具体实施及其地区经济扩张的关系,同时考察日本军政当局控制或影响地方政权的活动;第二,分析了在殖民政策的扶植下,日本民间资本、财阀资本、国家资本在山东投资经营的历史过程,理清其扩张的脉络,在比较分析不同时期日本资本扩张的方式、规模、结构和特点的基础上,研究日本产业资本由逐步渗透到全面控制经济命脉的过程和条件;第三,分析了日本各种经济势力在山东的利益指向与日本在山东殖民权益的关系,以及与殖民当局政策实施之间的关系,进而考察了这种关系的特征与互动机制,并就日本军事侵略、殖民统治与其经济扩张之间的关系做出相应的理论阐述。

另一方面,自烟台开埠以后,通过资本主义国家强加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及不断扩大的贸易与投资,山东社会经济已在相当程度上从属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同时,山东区域经济自身也在经历着由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日本的入侵和资本扩张活动构成了这一变迁过程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经济变量,与日本工商资本扩张相联系的移民、贸易、资本输出、企业经营、技术转移等历史过程,实际与区域社会经济自身的演变构成了一个互动的历史复合体。这一变量因素究竟对区域社会经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同时又是在怎样的背景和条件下,以何种方式、途径影响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始终是关系到中日关系史与经济史的重要问题。换句话说,虽然《日》书的

主题是探讨日本殖民政策实施与其工商资本扩张的关系,内容涵盖了殖民政策如何影响和推动经济扩张,以及在政策支持下日本工商资本扩张的特点、步骤与变化等,但同时又从区域社会经济变迁的角度,探讨日本工商资本与近代山东社会经济的关系,包括这种关系的内涵、外延、影响诸因素以及相关评价等。

正是基于上述思路,《日》书将日本推行的殖民政策、日本工商资本的投资扩张以及对山东社会经济演变的影响作为线索,以三者的相互关系为视角,并将分析框架建立在三者关系的互动变化脉络上。在这一分析框架之内,将日本工商资本作为一种经济变量和导致区域社会经济变化以至恶化的历史诱因之一,在综合各个相关因素的基础上,分析其对近代区域商品生产、流通、消费的影响。同时,从产业变迁、市场供需变化等方面,将日本工商资本的扩张与各个时期社会经济的变化加以对照,解释其在不同时期对地区经济的双重性作用;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部门、行业和企业进行案例研究,结合实证量化分析,解释日本工商资本在各个时期扩张的特点。从这样一种新颖的视角进行研究,有助于形成对历史过程的总体性认识,从而深化对近代区域经济变迁的理解。

三

正如《日》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近代山东曾长期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成为除台湾、东北地区以外日本在中国的“特殊权益地区”。另一方面,日本工商资本在山东的扩张也具有阶段性特征,因而增加了学术研究的困难性,致使《日》书在某些方面未能达到预期目的,特别是在带有普遍性的理论探讨方面,尚存在比较研究的必要。具体地说,为说明日本的殖民政策及其工商资本的扩张,该书花费了相当的篇幅分析日本在山东的

移民活动,并强调指出日本移民是日本对华经济扩张和殖民地经营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日本工商资本的投资经营活动密切相关。新占殖民地对移民的吸引力源自政治经济特权,而日本当局的鼓励和支持成为其直接的推动力。

根据作者的分析,日本移民分为与资本经营活动有关的资本移民、从事技术职业的技术移民、既无资本又无技术的谋生式移民三个部分。从时间上看,甲午战争后,日本移民便以战胜国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山东沿海城市与内地城镇,而且随着日本殖民政策的推行和工商资本投资的扩大。移民的规模也在随之不断扩大,分布范围由最初的口岸城市向铁路沿线城镇、矿产区以及内地集散市场扩展。移民的人口构成和职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永久性的家庭移民代替早先的单身移民,在原先商业移民和谋生式移民的基础上,资本移民、技术移民的比例逐步提高,移民与资本结合的程度愈加密切,与工矿业、贸易、金融、交通等领域经营活动的关系愈加突出。但是,作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缺乏与相关地区的比较。山东作为日本在华的“特殊权益地区”,既与割让给日本的中国台湾地区、日本吞并的朝鲜半岛地区、日本通过傀儡国进行实际统治的中国东北地区不同,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其他日本占领地不同。通过比较,恰有助于阐明日本在山东移民活动的独特内涵及殖民政策的本质。而比较研究和相关意义的阐释,不仅需要深化区域研究,而且有待于对日本殖民扩张政策及经济扩张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

作为一种开拓性研究尝试,《日》书作者试图通过阐述近代工业技术的转移,探讨殖民政策、资本扩张与区域社会经济演变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形成对历史过程的总体性认识。作者强调指出,日本技术的扩散首先且主要是在低层次的技术领域,而不是机械化的生产领域,使用范围集中在农村和乡镇,使用者也多是手工业者

和家庭作坊。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日本工业技术的引进才开始逐渐扩展至火柴、印染、机械、橡胶等行业,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仿制扩散效应,但相关技术向民族工业的转移过程往往受到人为的限制和阻挠,始终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技术转移。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工商资本逐渐控制了山东的经济命脉,结果造成地区市场经济与产业发展的畸形状态,并最终延误了区域社会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这一分析是成功的,但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其论证则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也就是说,尽管作者强调“考察日本在山东的殖民扩张政策和工商资本的投资经营,必须重视其对区域社会经济变迁过程的影响,将两者的关系作为分析的落脚点和归宿”,但由于未能从不同的时空角度对这一关系加以具体而系统的分析,在理论阐释层面上缺乏逆向性分析的空间与基础,这不能不说是该书研究所留有的缺憾。

(作者王新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荣维木)